

序

為紀念《新青年》雜誌於 1915 年出版，亦為了思考香港的青年問題——尤其近年香港青年的政治言行引發社會熱議的現象，我們在 2014 年香港政治環境波譎雲詭的時刻埋首研究，目的是利用回歸後積累下來的民意調查數據，梳理香港青年政治態度與政府管治等不同層面的變化，並於 2015 年完成初稿，爭取在年底出版，希望趕上《新青年》「百年紀念」的尾班車。

然而，在籌劃出版時我們察覺到，受 2014 年佔領運動失敗的影響，當時香港社會仍甚「情緒化」，青年尤其躁動未止，言行更趨激烈、「勇武」，包括萌生分離主義，若在那時作出階段性結論，恐怕言之過早。再者，政府對發起和帶領運動人士的檢控仍未有結果，市民對整個問題或未夠時間深思熟慮，所以我們決定延後出版計劃，給予時日讓事件沉澱，再作跟進調查，同時修改書稿、豐富內容。

一如預期，2014 年之後，無論整體社會或是年輕世代，政治態度呈現了巨大變化，大有激情過後一切歸於平淡的跡象，這「重回常軌」的趨勢清晰地反映在嗣後四年的民意調查上，讓人看到問題的後續發展與轉變，俾能提出更全面、透徹的分析。

到了今年，適值 1919 年五四運動一百周年，我們覺得這實在是更具意義的日子，因為一來《新青年》在 1915 年出版後，

影響了無數中國人，尤其激發了不少人的愛國情懷，以及對國家民族在內憂外患時刻應何去何從的思考，惟當中的「過激過急」曾招來批評，亦帶來傷害。二來是 2014 年的佔領運動，亦有人將之類比五四運動，藉以號召青年加入、呼喚社會覺醒，當中的「過激過急」同樣招來批評，亦帶來傷害。

正因如此，在本書的最後一章，我們提出一個歷史回顧與分析，扼要地指出，近代中國自十九世紀中葉起因為國力急墜，招來外侮，一度瀕於民族覆亡，令平民百姓、知識分子、政商官賈，均吃盡苦頭，不斷思考救國強國之道。至於到底是「全盤西化式」的現代化，抑或是按照自身歷史、文化和現實環境的「折衷式」現代化，則屬兩條截然不同、並挑起最激烈爭議的道路。

他山之石，可以為錯。不少發展中國家，亦如中華民族般飽受外敵侵略欺凌，在察覺到自身實力不如歐美後，渴求奮發自強，卻發現要徹底學習歐美、「全盤西化」，又會因種族、文化、歷史、宗教，甚至地理、氣候及環境等差異，不能硬套照搬，可「折衷式」變革亦困難重重，罕見奏效。反觀中華民族，由瀕於滅族亡國、一窮二白，最終憑着堅持改革開放，走出自己的發展道路，應可為眾多發展中國家提供一些參考。

本書的核心觀點亦建基於此，因為 2014 年的佔領運動，既有支持者呼應全球化民主浪潮，奉歐美模式為「國際標準」的一面，亦有反對者主張秉持中華民族發展經驗，筆路藍縷以闢蹊徑的一面。香港過去其實亦沿着一條特殊道路前進，並取得可觀佳績。香港青年群體在當時的思考與行動，既引起社會高度關注，亦深具學術研究價值，他們的家國觀念急轉直下，尤其帶出另一些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，亟待跟進。

在本研究中，我們根據回歸 20 年來的民意調查實徵數據，勾勒年輕世代的政治態度變化趨勢，檢視態度丕變的社經政治脈絡，並辨別年齡、時期及世代因素對政治態度的獨立影響，

研究過程中難免碰到各種各樣問題，包括調查數據未夠全面、分析角度未夠周延、學術根底未夠扎實等。為此，我們雖策駑礪鈍，求是求真，還是無法排除秕糠錯漏，但願讀者朋友有以教我，不吝賜正，令我們日後的研究得以寸進。

這一研究項目最終能夠完成，實有賴眾多師長、友濟、同事及機構給予寶貴意見、支持和協助，我們特別感謝我所所長張妙清教授無間的鼓勵與提攜，我倆恩師黃紹倫教授和劉兆佳教授的耳提面命與高情厚愛。同事沈國祥和葉天生執行歷年調查、黃子為和鍾雪怡協助分析數據、梁月蓮和陳韻晴負責文稿校對，我們不勝感激。最後，眾多市民撥冗接受訪問，在此謹誌謝忱。